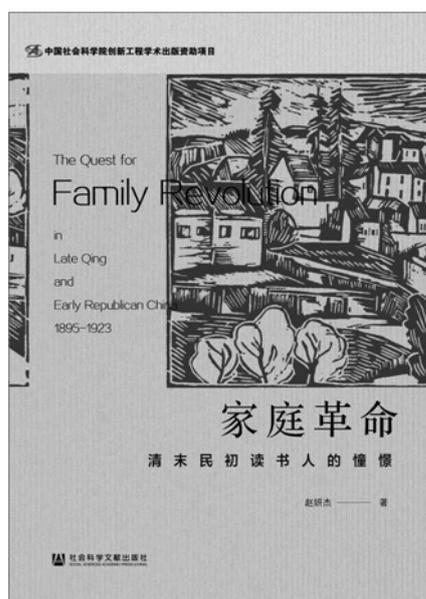


在歷史的常態與變態之間

——評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

● 杏亮亮

究竟近代中國家庭的負面形象如何被後來的人們接受並認可？《家庭革命》一書梳理了近代中國家庭負面化的過程，展現了在歷史發展中變態現象如何演化為常態，並以此說明家庭革命對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



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一 學術立意

家庭作為傳統社會的象徵，歷來受到人們的尊重，然而在清末民

初趨新士人的眼中，卻成為阻礙國家強盛、個人自由的桎梏，雖然這樣的現象有其內在邏輯，但是不論從長時段眼光，還是時人嚮往的歐美社會來看，家庭仍然作為一個正面形象被人們坦然接受。弔詭的是，這樣一種反常的現象不僅為時人所認可，即便是後來的研究者也往往將這樣的不尋常現象視為正常。究竟近代中國家庭的負面形象如何被後來的人們接受並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妍杰博士的《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以下簡稱《家庭革命》，引用只註頁碼）試圖回答了這一提問。本書梳理了近代中國家庭負面化的過程，展現了在歷史發展中變態現象如何演化為常態，並以此說明家庭革命對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

「家庭革命」是一個在中國近代史領域被廣泛討論的話題，相關論著很多，所選取的角度也多種多樣。在現代化和革命史兩個學術脈絡當中，家庭革命的價值基本上都

是被肯定的(頁15)。但是如羅志田所言：「在我們的史學中，有相當一些問題，涉及的內容人人認為應知，且往往感覺已知，實則所知不詳不確」，家庭革命「就是一個彷彿眾皆認可，其實未必真知，甚至充滿誤解的題目」^①。羅志田為本書撰寫的〈序〉非常獨到地指出：「人們受特定傾向的影響而轉變眼光後，把變態視為常態而不自知。」(〈序〉，頁iv)本書作者正是秉持這一理念，對學術史展開回顧並闡述自己的立意。

作者對前人的研究作出了細緻的剖析，認為已有研究還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以「衝擊—反應」的模式來解釋家庭革命，雖然西方的「廢家」思想衝擊了中國，但是已有研究沒有觸及到西方的「重家」思想為何在中國沒有引起迴響這一問題；二是在革命史和現代化脈絡中，關於家庭革命的論述側重各有不同，但是對這一思想變化的前因後果，以及自身言說重心的轉變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頁14-15)。對於涉及到家庭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作者在相關章節中予以回顧和探討。

《家庭革命》主要關注的是思想層面的變動，注重清末民初以來時人在家庭革命這一問題上展現出的差異與共性，着重於對具體問題的辨析。總而言之，本書所呈現出的諸多改革家庭的呼聲或思想觀念、各種甚囂塵上的言論反映了近代中國的「亂」。在羅志田看來，「近代中國何以久亂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一個文化、社會、思想的重心」^②。王汎森則說：「晚清

以來是一個大的『離心力』的時代，故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皆一再提到中國是一盤散沙。」^③

近代中國在西潮衝擊之下，傳統的倫理與文化難以立足，新的思想資源也凌亂無序。所以在這樣一個整體失範的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方式無意識間被西方文化所改變。反映到家庭革命這一問題上，就是書中所呈現的或超前、或實際的，面相繁雜的改革家庭的呼聲。因此，將本書放在近代中國社會思想失去重心的背景之下，其價值是從家庭變革的角度詮釋這一思想脈絡，又跳出一般的家庭革命研究框架，具有更高的思想史方面的意義。作者在書中常反思的一個問題是：家庭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正面的形象總是居於首位的，為何在清末民初成為了中國知識份子革命的對象？近代中國的特異性由此可見一斑。

在「引言」中，作者進一步指出：家庭革命並不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孤立的歷史現象，它的產生有多重語境和長遠背景。中國傳統政治秩序被西力催解，皇帝權威逐漸崩塌，依附於此的一整套價值系統亦隨之崩潰，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國家、個人自由的政治正確。而近代中國又是國家不斷遭受屈辱、個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時代，圖強的時人反思、探索未來的出路，而最終將矛頭都指向了作為社會最基層的單位——家庭，家庭革命就在這樣的語境下產生。與家庭相關的婚姻制度、個人解放、親子關係，甚至整個人類社會的倫理關係都成為當時趨新人士討論的話題。然而，

《家庭革命》主要關注的是思想層面的變動，注重清末民初以來時人在家庭革命這一問題上展現出的差異與共性，着重於對具體問題的辨析。本書所呈現出的諸多改革家庭的呼聲或思想觀念、各種甚囂塵上的言論反映了近代中國的「亂」。

清末以來救國的迫切性使得「國家」觀念迅速崛起，在國家意識構建的過程中，「國民」觀念居於中心，而「家人」觀念則退居邊緣。在愛國與愛家不能兼顧的情況下，「為國破家」的觀念使得家庭淪為被革命的對象。

從舊家庭「逃難」出來的新青年發現他們在社會上無所憑藉，理想無法照進現實，從而產生了苦悶與煩惱，難以適從的現實催生他們構建新社會的理想。歷史似乎就在這樣一個打破、重建的過程中螺旋前進，但是「黑暗」的舊家庭成為了一種存在於人們想像中的刻板印象，這其中的過程與理路需要重新審視。

基於以上考量，作者緊緊圍繞「家庭革命」這一主題，討論家庭如何從一個正面的社會建制變成一個負面的、可以廢除的社會組織；分析究竟是哪些思想、學說和社會力量促成了這一轉變，並嘗試描繪作為一種觀念的家庭革命向現實社會滲透的路徑，揭示清末民初家庭革命複雜的面相，着重從思想史層面討論近代家庭轉型的豐富內涵。同時，作者也討論了這一時期備受爭論的早婚、納妾、兒童公育、新式婚姻觀念等問題，對於理解近代家庭革命這一議題大有裨益，也是對婦女史、家庭史等研究方向的有益補充。

二 主體內容

本書正文的論述，大致以問題為線索，共分為五部分，分別探討相關問題。

第一部分是「家庭革命的興起與革新家庭的思考」，由第一至五章構成。作者由清末家庭革命之肇興談起，認為清末以來救國的迫切性使得「國家」觀念迅速崛起，在國家意識構建的過程中，「國民」觀

念居於中心，而「家人」觀念則退居邊緣。愛國與愛家之間產生了緊張，在兩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為國破家」的觀念使得家庭淪為被革命的對象（頁21-23）。而與家庭相關聯的宗族同樣被視為強國的障礙，在「愛國」的名義下，傳統宗法社會的核心——君臣、父子、夫婦構成的三綱與外在的載體宗族組織，紛紛淪為被批評的對象，家庭的形象在近代中國日趨負面化（頁26-27）。除為國破家之外，近代一些知識份子因為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意，往往會設想一個無國無家的理想世界，原本由家庭所承擔的責任在他們的設想中均被不同的新制度所代替，廢婚毀家以重構社會的言說也成為了近代中國家庭革命脈絡的一部分（頁36-37）。

第二部分是「苦與樂：五四時期對家庭的想像與憧憬」，由第六、七章構成。作者首先從維繫家庭的核心道德「孝」之地位不斷下降來切入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伴隨近代以來的中西之爭、新舊之別以及公私之分，孝道成為舊道德的象徵，是私德的體現，並且與自由人格相對立，「孝與忠的混同是儒家孝道思想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大問題，也是民國以來一部分人士攻擊儒家有助於專制的癥結之一」（頁127）。隨着時代的變遷，忠君、孝親一變而成為政治革命和家庭革命的對象。隨着白話文的流行，在近代報刊等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愈來愈多青年在報端傾訴家庭的黑暗、個人的苦悶。這些因家庭而產生的痛苦在青年群體中間不斷發酵，引起共鳴。「非孝」從單個家

庭被抽象為整個社會所有家庭的問題，家庭、道德、傳統逐漸「問題化」。與此同時，對政治、社會的不滿和無力感也轉移到家庭（傳統的承載者）身上，將家庭視作黑暗政治以及萬惡社會的表現和根源。最終便如陳獨秀所說：「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故不得去此而取彼。」（頁150）

第三部分是「情感對制度的衝擊：新婚姻觀念的幾個核心主張」，由第八至十章構成。這一部分呈現的是家庭革命產生了追求個人幸福的訴求，而夫婦愛情又是個人幸福的重要部分，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傳統婚姻、妻妾制度的抨擊，提倡基於自由戀愛而組成的一夫一妻家庭。愛情對青年知識份子而言，是一個具有強大衝擊力的話題。當原本嚴密的社會傳統出現縫隙，個人幸福和兩性關係可以被公開討論之後，曾經被壓抑、深藏在內心的想法得以洶湧流露出來。從抨擊一夫多妻、對包辦婚姻的不滿，到宣揚自由戀愛，以至廢除婚姻制度；從男女平等、離合自由，到情欲公開、兒童公育，家庭革命走向「嚮往一種以廢除婚姻、只要戀愛的『自由戀愛』（free love）為特徵的兩性關係」（頁181）。一些激進的知識份子不僅在報刊上呼籲「交際自由」，打破傳統的桎梏，更是身體力行，離家出走，在社會上尋求真正的自由，可見青年有從思想革命走向社會革命的趨勢。

第四部分是「個人與互助：家庭革命的社會脈絡」，由第十一、十二章構成。作者轉換視角，即超

越家國體系，從時人看待世界和個人兩方面的角度來觀察他們對家庭的態度。然而無一例外的是，家庭一方面被認為是實現大同世界的妨礙，另一方面被視為個人自我實現的障礙（頁248）。因家庭問題（如父母為子女訂婚、子女對家族作風的不滿）而產生的痛苦，同時夾雜着因國運不濟而產生的焦慮，於是青年極端地試圖以革命的手段來解決人生、社會和政治的整體問題，也就是作者所說的「青年欲脫離家庭而獨立生活，革命既給他們提供了一條出路，也賦予家庭革命以深遠的政治和社會意義」（頁281）。

第五部分是「比較視野中的家庭革命」，由第十三、十四章構成。在傳統的思想倫理觀念不斷受西潮衝擊的狀況下，新的觀念層出不窮，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進步與現代的意義，作者則試圖借助歐化的結婚禮儀來呈現這一時期的歷史複雜性（頁286-92）。作者簡要梳理了家庭在西方政治思想和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地位，藉此反思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作者認為，從柏拉圖到馬克思，雖然西方存在「廢家」的思想系譜，但是「重家」的傳統或許才是常態，「家庭在主流思想與日常生活中仍是溫暖的象徵」（頁317）。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在效仿西方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何以走上「廢家」的異路呢？

通讀全書，可以看出作者提出了幾點觀察。第一，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並不是線性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與訴求，甚至不同團體與個人所追求的「新世界」也

家庭一方面被認為是實現大同世界的妨礙，另一方面被視為個人自我實現的障礙。因家庭問題而產生的痛苦，同時夾雜着因國運不濟而產生的焦慮，於是青年極端地試圖以革命的手段來解決人生、社會和政治的整體問題。

近代家庭最顯要的特徵是「變化」。作者並不局限於歸納總結各種家庭觀念和改革主張，而是能夠深入考察在這些言論和思想背後的社會背景、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以及思想變化。

不一致。家庭革命及其衍生出的問題更多是互相糾纏的，出於這樣的考慮，作者沒有嚴格沿襲某一種範式，而是從具體的情景與問題進行思考。第二，誰在進行家庭革命？家庭為何會被負面化以致問題化？作者認為，在西潮衝擊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傳統倫理逐漸失去憑藉，家庭作為「舊文化」的代表，一起遭到趨新知識份子的抨擊。第三，在時人的憧憬中，廢除家庭之後的生活究竟是甚麼樣子？時人提出了諸如兒童公育（頁102）、西式小家庭（頁143），甚至是「看破國界、種族」的「結婚的真正自由」（頁189）。但是在諸如身份、邊界這些符號消失之後，所帶來的結局又往往是個人的迷失，這中間的複雜關係殊難討論。第四，家庭革命究竟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作者展現了在家庭革命言說影響之下，傳統納妾制度遭到鄙棄、婚姻意義發生改變、人們進一步思考愛情與人生之間的意義，還有新式婚姻法的出台，等等。

三 本書優點與缺點

若將本書放在家庭史研究的脈絡中，則會認識到作者探討家庭革命時具有的更廣闊的視野。其一，在問題意識上，近代家庭最顯要的特徵是「變化」，本書研究內容最豐富的就是各種家庭改革主張的湧現及其體現的家庭觀念變化。而家庭實態的變化好像總是滯後於觀念的嬗變，故近代以來一浪高過一浪的

改革呼聲更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④。作者並不局限於歸納總結各種家庭觀念和改革主張，而是能夠深入考察在這些言論和思想背後的社會背景、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以及思想變化。以對廢婚毀家論的討論為例，作者跳出以往研究中對這一話題所產生的價值是否積極的爭論，從時人嘗試重構社會的角度出發，分析士人在西潮衝擊、辛亥鼎革的背景下的複雜心路，即個人與社會何去何從的問題：「家庭革命者以主義而不是血緣和親情來凝聚社會，試圖通過家庭革命建立一個公正、完美的理想社會……賦予中國革命之後的社會重建以道德意義……強調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家庭。」（頁60）

不過，作者更多言變而少言常，這一方面略有不足。人生的青少年時期，似乎總和家庭、家長產生更多的矛盾，五四時期的青年也不例外。如今所見當時一些青年在報刊上控訴父權、家長的專制，訴諸個人的痛苦，表達和傳統勢不兩立的決心，這樣帶有鮮明感情色彩的呢喃，恐怕更多只是個人一時的情感宣洩，缺乏理性，但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近代中國家庭的負面形象。進一步需要思考的是，這些控訴家族專制、追求個人幸福的青年大多數擁有不俗的家庭背景，因此他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去廢婚毀家，追求精神層面的解放。然而，娶妻生子、組建家庭仍然是當時社會的常態。潘光旦於1926年在上海對317名居民進行調查，有71%的人不贊成大家族制度，但是也

有59.5%的人反對歐美的小家庭制度，更多的人趨向折衷家庭^⑤，可見家庭在當時人們心中仍有較高的地位。在知識份子中間甚囂塵上的家庭革命在整個社會所有群體之間產生的反應，或許並沒有言說者所提到的那麼廣泛和深刻。觀念與社會現實之間或許仍是兩個世界^⑥。

其二，在觀點展示上，作者並不是孤立地看待這些家庭觀念與問題，在本書中，廢婚毀家論這一爭議較多的思想與當時學界所討論的新婚姻道德、自由戀愛、獨身主義等思潮是相關聯的。作者緊接着從更為具體的早婚、納妾、兒童公育等問題入手，去理解近代的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考察時人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影響政治制度的理路。本書能夠辯證性地看待當時諸多革新家庭的觀點，並不一味批評或讚揚，這種強調家庭良善功能的聲音值得重視。

作者也從古今中外更宏闊的角度去審視家庭變遷和家庭史研究，提出近代中國家庭觀念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異現象——「革家庭的命」（頁15）。這既是歷史長河中的變態發展，也是史學研究中能夠觀察問題的窗口。作者考察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其視野並不局限在國內，而是引入西方的政治思想與家庭史研究，不斷與西方關於家庭革命的思想脈絡進行對比與互動，在中西交互的視野下審視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以擴展視野，豐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不過，本書雖然展現了晚清、民國知識份子對待家庭態度的轉變

過程，以及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如何在西方衝擊、傳統崩潰的進程中淪為被破壞的對象，但是只論及思想層面似乎讓人意猶未盡。在反映主張家庭革命的青年如何具體實行革命方面，除了「工讀互助團」一章展現了青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困難之外，本書幾乎沒有為讀者提供改造某個家庭的具體案例，使得家庭革命某種程度上留下了「口頭革命」的印象，即思想史層面上的意義；對於實際運動的發展，似乎脫離得過遠了一些。如果在書中提供一些具體的個案，或許對於讀者認識這一問題有更大助益。

此外，本書主要關注思想和觀念層面，至於理念與現實之間如何聯繫與互動，對具體的社會與家庭生活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發掘的話題。需要注意的是，就家庭自身而言，其實質只是社會組織形式的一種，本身並沒有那麼多的語境與含義。所謂的「廢家」、「毀家」，真正所反對的是其背後的封建舊思想。家庭革命、解放思想，就是在向傳統倫理提出質疑與挑戰。但是家庭的要素是人，剔除家庭這一外殼之後，原來家庭中的人如何相處？他們之間的感情如何維繫？曾參與北伐軍的女兵謝冰瑩在其《從軍日記》中痛苦地寫下理想和現實的掙扎：「三哥，請你不要提到回去來刺我的心！」「母親，我不能歸來，任你如何熱望，也望不見你的鳳兒歸來。母親，這絕對不是我的殘忍，乃是……母親喲，乃是萬惡的封建勢力阻止了我。」^⑦因此，言及近

就家庭自身而言，其實質只是社會組織形式的一種，本身並沒有那麼多的語境與含義。所謂的「廢家」、「毀家」，真正所反對的是其背後的封建舊思想。家庭革命、解放思想，就是在向傳統倫理提出質疑與挑戰。

在家庭革命的語境之下，父母群體是失聲的。如果從近代知識份子倡言家庭革命，以及原來的舊家庭、家長以及普通百姓如何反應這兩個層面來論述家庭革命，似乎是對這一話題有益的補充。

代的家庭和革命史，需要注意當時特殊的背景以及青年所控訴的具體對象。

其三，在史料運用上，作者搜集了諸多生活在晚清、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著述、日記、回憶錄，以及這一時期報刊、雜誌上發表的關於女性地位或者家庭革新方面的評論、文章和讀者來信等，內容詳實且充分；不但再現了時人對於家庭革命這一問題的激烈思想碰撞和憧憬，並且將時人對於家庭觀念的考量放在近代中國思潮變動的大背景下，進行歷時性的考量與對照，同時也不乏小家庭議題與時代潮流之間互動的內容。

而不足之處則在於史料展現方式上羅列大於論析，以及使用了較多知識階層撰述的出版類史料，缺乏對其他社會階層觀點的關照，未能充分反映時人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的豐富性。此外，《家庭革命》中引述外文參考文獻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梳理和理論，仍然只是局限於觀念與願景層面，知識份子的憧憬對於社會文化產生的實際影響，值得用更多篇幅去探析。

四 延伸討論

本書存在可進一步討論與思考的空間。第一，當白話文興起之時，輿論幾乎處在新式知識份子的掌控中，我們可以見到青年在報刊言說自己的痛苦。但是原本完整的家庭卻因為青年的反叛而產生變動，之前的生活軌迹也完全改變，

由此在父母之間產生的痛苦與煩惱或許並不比青年少，但是我們卻幾乎無法得見。也就是說，在家庭革命的語境之下，父母群體是失聲的。從父母的角度看待子女「大逆不道」的行為，他們的思想變化如何？是繼續堅持家長的權威、維護傳統禮儀，還是受到子女的影響，逐漸在觀念上產生鬆動，從而改造家庭，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這是現有的研究所忽略的，本書也少有論及。如果從近代知識份子倡言家庭革命，以及原來的舊家庭、家長以及普通百姓如何反應這兩個層面來論述家庭革命，似乎是對這一話題有益的補充。

第二，受傳統家庭專制之苦的青年，最終的歸路如何？家庭革命作為一種思想潮流，有其自我發展演變的系譜與脈絡。隨着提倡家庭革命的那一代青年逐漸告別他們衝動、叛逆的青春時期，個人的成熟與家庭革命的消散之間是否有着更為深刻的關聯呢？當時諸多倡言家庭革命的青年後來基本都娶妻生子，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從個人或群體的角度追尋他們這一段心路歷程，或許對家庭革命發展理路能有清晰的掌握。

第三，革命的另一面是「反革命」，在思想多元的近代中國，反對家庭革命者也大有人在，這兩者之間如何互動，作者少有言及。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宣揚「中國社會之單位，實為家庭。家庭之組織是否健全以及子女之教育是否良善，關係於社會者至鉅」^⑧，官方論述明確肯定家庭對於社會穩定的重要

作用，思想潮流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的齟齬又如何互動？除卻思想觀念層面，近代的城市化浪潮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組織（學校、養老院、新式娛樂設施、宗教場所等），替代了原先由家庭承擔的部分社會功能，城市化和工業化深刻地改變了原來的家庭規模和功能，也就是說，家庭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自身也同時代浪潮一起劇烈變動，這與思想層面的家庭革命之間又有甚麼樣的聯繫呢？

第四，與家庭革命相關聯的另一問題是國民革命。在清末民初的時代激盪中，社會、鄉村、家庭甚至個體都無法把握原來自身的演變軌道，各種問題與矛盾交織在一起，最終在1920年代以革命為突破口而爆發。如前所述，謝冰瑩的二哥受盡了包辦婚姻的苦楚，便極力慫恿她去當兵：「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參加革命，婚姻問題和你未來的出路問題，才有辦法。」青年將革命看作解決個人和家庭問題的出路，即革命可以拯救自我，也可以拯救家庭。謝冰瑩回憶道：「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尋找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軍服，拿到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完成國民革命，建立富強的中國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⑦因此，知識青年何以走向革命、從尋找個人與家庭的出路到扛起國家富強的重擔，現實層面的考量與理念思路的轉變如何完成，並不是簡單的從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過渡，家庭革命與1920年代的革命浪潮之間有

着更為複雜的聯繫，這些思考與問題表明，家庭革命這一課題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

註釋

① 羅志田：〈重訪家庭革命：流通中的虛構與破壞中的建設〉，《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期，頁79-80。

② 羅志田：《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1。

③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甚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知識份子論叢》，第13輯（2015年2月），頁265。

④ 余華林：〈近20年來近代中國家庭史研究評述〉，《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頁164。

⑤ 潘光旦：《中國之家庭問題》（北京：新月書店，1929），頁40-42。也可參見陳蘊茜：〈論民國時期城市家庭制度的變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頁146-60。

⑥ 以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為例，即便在官方以及趨新人士的大力禁止與宣傳之下，「小腳為美」的觀念在民間社會，尤其是農村地區仍然普遍存在，並影響着實際的婚娶行為，遑論家庭革命這樣較為極端的思想觀念。參見楊興梅：〈觀念與社會：女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頁70-86。

⑦⑧ 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33-34；79-80。

⑨ 〈婦女節在中國的意義〉，《中央日報》，1935年3月8日，第2版。

杏亮亮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